

浙江考古遗址在保护中活化利用——

今天,我们怎样和历史“对话”

■ 本报记者 李娇俨 应忠彭 陈久忍 共享联盟·仙居 应芳露

从上山文化,到越地长歌,再到千年宋韵……自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以来,浙江已有21个项目入选。这份名单中,遗址数量不断增加,涵盖的人类文化版图也日渐扩大,浙江深厚的历史底蕴由此生动展现。

当越来越多曾被尘土掩埋的岁月重见天日,我们与过去“对话”的方式、与文化遗产的关系都在悄然生变。无论是考古工作者还是普通大众,都在拥抱、享受着前人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

浙江这21处遗址现状如何?得到了怎样的保护和利用?今天的我们,怎样通过这些遗址和历史“对话”?带着这些问题,近日,记者走访全省多处考古遗址。

持续探索 拼合出更全的历史面貌

汽车行驶在乡村公路,远远看到道路一侧宛如仙境的神仙居顶峰。与神仙居相对的另一边,就是入选202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仙居下汤遗址。

近1万年前,居住于此地的先民们种稻、建房、烧陶,一派人间烟火气。下汤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副主任仲召兵告诉记者,从遗址中心地层剖面上看,下汤遗址包含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个阶段,以上山文化遗存为主。“它是我国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是我国万年文化独立起源、绵延发展的生动范例。”

近期,考古人员新发现了该遗址中迄今为止埋藏器物最多的器物坑,这极有可能是一座高等级墓葬。现在,省考古所正按照考古中国课题计划,继续厘清遗址的聚落形态,同时开展多学科研究,并和中科院、北京大学等合作进行土样提取、器物坑功能研究等。随着研究的深入,考古工作者会更清晰地描绘出当时的图景。

距离此地100多公里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旁,已有一座新布置的临时展示馆。走进馆内,“一片繁华海上头——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成果展”正在展出。温州商学院的学生们正在馆内参观。“古港遗址的出土文物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一名学生告诉记者。

展示馆外,考古工作者刚结束对一艘古沉船的科学处理和整体提取,它被转移至江心西园沉船保护基地后,将得以进一步修复和保护。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梁岩华告诉记者,目前对沉船的保护研究是重点工作,同时工作人员也在奉恩门区域进行考古挖掘,希望找到更多的码头,验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

浙江入选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中,越来越多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遗址出现,填补了人们对历史认知的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年,浙江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重要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尤其是近五年,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仙居下汤遗址等相继入选,展现出浙江考古的持续活力。

良渚,就是展现持续活力的典型之一。浙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遗址,早先多集中于良渚文化。1991年,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和大墓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3年,余杭良渚文化反山大墓和瑶山祭坛遗址又入选;此后余杭良渚文化古城遗址、余杭玉架山遗址、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等与良渚文化有关的考古新发现接连入选。王巍表示:“对于这点,我觉得要高度称赞。有的遗址评上‘十大’就万事大吉了,但良渚确实持续在做。”

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这样的努力背后,潜藏着拼合出更全历史面貌的希望。当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过去的面貌,才能更完整地理解自身历史与遗址价值。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说:“考古就像在黑暗中探索洞穴,每一次发现都像偶然照亮的闪光。随着系统性研究的深入,这些四散的闪光终将连成一片,串联起历史的脉络——就像跨湖桥遗址连接了上山、河姆渡和良渚文化那样。”



绍兴印山越国王陵。

受访者供图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临时展馆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

受访者供图



仙居下汤遗址,考古人员在工作(资料图)。

仙居县博物馆供图



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

视觉中国供图

链接

浙江入选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

1991年	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和大墓	2005年	嵊州小黄山遗址
1993年	余杭良渚文化反山大墓和瑶山祭坛遗址	2007年	余杭良渚文化古城遗址
1995年	杭州南宋太庙遗址	2011年	余杭玉架山遗址
1998年	绍兴印山大墓、慈溪上林湖寺龙口窑址	2014年	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
2000年	杭州南宋临安府治遗址	2015年	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
2001年	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杭州雷峰塔遗址、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杭州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	2016年	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
2002年	宁波元代庆元路永丰库遗址	2020年	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
2004年	杭州严官巷南宋临安城御街遗址	2022年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2024年	仙居下汤遗址

转变观念 交流互动共享文化遗产

沿着南宋御街中轴线漫步,杭州人小单和朋友在街上的拱门、水道旁打卡拍照,逛累了在街边小店来一杯杭州老酸奶,十分悠哉。如果有外地朋友来,小单都会带他们到这里游玩,“一提起杭州很多人就想到西湖,但对我而言,这座城市的千年文脉,我在御街感受得最明显。”小单告诉记者。

南宋御街遗址入选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这里,一边是现代生活的繁华,一边是历代古城变迁积淀的厚重,别样的体验带来了川流不息的人潮。

浙大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杜正贤主持发掘过多个杭州城市考古遗址,并五度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他认为,在杭州,包括南宋御街在内的众多遗址不仅被有效保护,且大部分对公众开放,让普通人也能感受杭州的传统底蕴,触摸历史肌理。

秦岭也认为,浙江大地上来自遥远岁月的人类遗迹,“人榜”带来的大众关注度弥足珍贵。“有了关注度,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认识和保护意识,此类遗址保护才会得到普遍重视和认可。”秦岭说。

在下汤遗址保护与发展的过程中,当地村民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张金苗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1987年,仙居县成立下汤遗址保护小组,下汤人张金苗成为首批文保员。他每天巡察遗址,及时制止破坏行为。考古队进驻之后,又为考古队和政府部门、村民搭建起沟通的桥梁。随着公众文物保护意识提升,“张金苗”越来越多。

最近几年,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爆红,考古空间探秘类文化节目《中国考古大会》让年轻观众纷纷“入坑”……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公众对文物的关注和文

保意识的提升。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的一项调查显示,83.4%的受访者平时会关注与文物有关的信息,77.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已有保护文物的意识。

不只公众观念在转变,考古工作者的观念也在转变。

仲召兵说起一个变化让记者颇有感触:下汤遗址新的发掘工作刚开展就接受采访,这在前些年还比较少见,相当一部分考古工作者会直接拒绝。那个时候,大家对与公众交流不如现在重视。

仲召兵说,今天的考古工作需要与公众交流互动,让更多人知晓。除了下汤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外,他们还要进一步做好下汤遗址文化内涵的传承和传播,通过文化遗址公园建设、发展文旅等方式让群众受益。

良渚的创新实践同样可圈可点——不仅将考古成果转化为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更通过场景体验,让文化遗产“活”在人们身边。

走进良渚博物院,文创商店成为良渚IP的集中展示地,玉琮主题饰品、神徽图案丝巾等爆款产品让人目不暇接。为进一步挖掘提炼良渚文化的美学价值和艺术内核,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杭州良渚日启动实施了“良渚MEI”生活美学工程,成立了由多家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组成的“良渚MEI”生活美学联盟。“良渚MEI”生活美学工程,多维度解构良渚文化,以此为基础开发了600余款文创产品,给每款产品赋予了文化故事,2024年的销售额达2.7亿元。

这些遗址正从专业考古的范畴走向公众共享的空间,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不断拓展 入选“十大”是个新的开始

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非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之江大地上的考古遗址,引发了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更纵深的思考。

目前,仙居正开展下汤稻作文化遗址公园建设,总投资约1.49亿元的一期工程“下汤遗址博物馆及周边配套设施项目”已于2025年2月底开工。值得注意的是,从《下汤遗址保护规划》通过项目审批到开工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只用了两年时间,这样的速度在同类项目中并不多见,充分体现了当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决心。

记者看到,下汤遗址核心区附近的农房已基本拆除,只剩几栋房屋,未来将改造成遗址公园的配套服务设施。距离下汤遗址核心区约一公里的一处工地上,工人们正加紧施工。

仙居县博物馆馆长郭慧说,这里将建成下汤遗址新考古工作站及配套设施,原村民将集中安置在与下汤遗址博物馆毗邻的区域。未来,安置村还可依托遗址公园发展配套服务,同时通过旅游业为村民创造经济收益。

在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还未完全对公众开放,但一个更具发展视野的计划在酝酿实施。温州市朔门古港建设管理中心主任陈铤介绍,温州正在打造“最温州、最人文、最好玩、最可持续”的文旅深度融合样板,谋划建设朔门古港考古遗址公园。该区域正启动实施朔门古港遗址本体保护展示工程与街区提升工程,形成集研学、休闲、考古为一体的“海丝”文化公共空间。

这些鲜活的实践,不仅愈发清晰地勾勒出历史文明的轮廓,更引出一个深刻命题——如何让沉睡的遗址真正“活”在当下?

秦岭告诉记者,2022年是中国考古发展的关键节点。这一年,中国发布《“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使中国考古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力量;这一年,恰逢《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公约》诞生5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下一个50年”活动,展望未来发展。

站在这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下一个50年”为考古遗址保护利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引发我们更深层的思考。

“下一个50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可持续性。考古遗址历经千万年留存,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拓展。

实际上,除了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许多遗址都在进行后续挖掘、整理工作。

在慈溪,入选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上林湖后司岙秘色瓷窑址,已整理出数万件标本。2019年,《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该项目已于去年结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室主任谢西营告诉记者,考古研究报告初稿的编写已基本完成,相关研究也在持续开展,遗址价值也将继续深入阐释。

在绍兴,柯桥区启动“绍兴越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柯桥区博物馆(柯桥区文保所)副馆长汪永祥介绍,为配合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做好印山越国王陵保护工作,近期对建成多年的王陵钢结构保护大棚屋面完成了修缮,正等待上级文物行政部门进行竣工验收。同时,柯桥区文物部门还委托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牵头开展了“印山越国王陵保护工程前期研究项目”和王陵墓室木炭抢救性加固方案编制,前期研究中中期报告已完成,木炭抢险加固方案已上报国家文物局审批。

“下一个50年”的主要挑战还包括可及性。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是为全人类认可和共享。秦岭认为,应当自觉地把共享与传播作为“遗产管理与保护”中的重要内容,除了通过遗址公园、博物馆等实体建设的有形方式,还可以通过无形的方式实现,如媒体报道。总而言之,理想的保护模式应让各方,包括遗产研究者、管理者、受众,均成为受益者,形成共赢生态。



良渚莫角山遗址(局部)。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